读史札记

清代北京的朝鲜使馆

祁庆富　金成南

历史上，朝鲜与中国是地理位置最接近、关系最密切的邻邦。清代，朝鲜派往中国的官方使团络绎不绝。清入关前，朝鲜定期派遣冬至、正朝、圣节、岁币（亦称年贡）等四行，清顺治二年（1645），此四行并为冬至使。此外，还有谢恩、奏请、辩诬、陈奏、进贺、问安、进香、告讣等多种名目。[①]派遣使团，是朝鲜人员往来清朝的唯一渠道，主要使臣是正使、副使和书状官，称为“三使”。绝大部分随员都是公务人员，但也有少数具有一定身份的知识人由于与三使有特殊关系参加使团，以私人参观访问为目的，并不担负官方任务，比较出名的有 1712 年访华的金昌业（1658–1721）、1780 年访华的朴趾源，1765 年访华的洪大容也属于这种情况。

朝鲜时期究竟有多少个使团、有多少人访问过中国？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仅据朝鲜末期编纂的文献统计，自仁祖十四年（清崇德元年，1636）至 1894 年（光绪二十年），朝鲜派往中国的使团有 661 次。[②]朝鲜使团的名目不同，任务不同，规格不同，每个使团的人数也不一样。一般来说，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朝鲜王朝五百多年间，正是通过官方使团，与明朝、清朝保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而明、清方面，接待朝鲜使团是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之一，在首都北京，一直设立专门接待朝鲜使团的固定使馆——朝鲜馆。

一、北京的玉河馆和南馆

北京接待朝鲜使团的使馆始于明代。明时由礼部主管外藩朝贡接待给赐之事。永乐初年，设置专门接待朝贡使臣的馆所，称“会同馆”。[③]兵部职官中有会同馆大使一人，副使二人。[④]明朝会同馆本馆在今王府井大街东单三条胡同以北一带。此外，又建造“别馆”，专门供使臣居住，也称为“会同馆”。1487 年（朝鲜成宗十八年，明成化二十三年）朝鲜锦南先生崔溥在海上遇风暴，飘流到中国，来到北京，住在会同馆别馆。他说：“臣等所寓之馆在玉河之南，故亦号为玉河馆。”[⑤]明万历二年（宣祖七年，1574）荷谷许　（1551–1588）出使明朝，也住在玉河馆。他在《荷谷先生朝天记》中写道：

> 至朝阳门，此京师之正东门也。入门，过大慈延福宫、大市街、广仁街、长安街、会同馆、玉河东堤、翰林院詹事府、玉河桥，至玉河馆。馆在玉河之南，故名。馆有东西二所，余等寓于东馆。馆之制，后建大厅，翼以东西两房，自厅前延以月廊，接于中厅。而又有东西房，其左右构长廊。此为一行所处之地也。[⑥]

玉河，是从什刹海沿紫禁城之东流向城南的一条人工河流，在与东长安街交汇处有玉河

[收稿日期] 2003- 11- 15
[作者简介] 祁庆富（1945—），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北京 100081；金成南（1956—），女，韩国成均馆大学教授

北桥，在与南城墙交汇处有玉河南桥，南桥北面不远有一桥称“玉河中桥”，故地位置在今正义路与东交民巷交叉路口处。玉河馆位于玉河中桥之西不远处。玉河故道今为正义路，玉河馆的位置在今东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大楼一带。

明代玉河馆是会同馆的“别馆”，虽然朝鲜使团住在这里，但还不是专门的朝鲜使馆。清初，仍沿袭明代制度，继续设置会同馆，改称为“会同四译馆”。除玉河馆外，又增设二处。《日下旧闻考》说：

> 明会同馆在玉河桥西，国朝改设会同四译馆。其外有朝贡使人之馆舍三：一在宣武门内京畿道胡同，一在宣武门外横街，一在东江米巷御河桥。⑦

孝宗三十四年（顺治十三年，1656），以麟坪大君（1622- 1658）为正使的谢恩使团抵达北京，副使以下均住在玉河馆。1712 年（肃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著名学者金昌业（1658- 1721）随其兄，冬至兼谢恩行正使金昌集访问北京时，也住在玉河馆。他在《老稼斋日记》中记述：

> 过玉河桥数百步许，至馆。馆在路旁北边。通官辈皆在大门内以迎，使臣举手为礼，而过入中门。门内有东西廊屋，皆崩塌，此员译辈所处也。又入一小门，始有正堂及左右月廊，而庭宇荒凉，尘土满屋。向夕风不止，日极寒，一行无依着，栖遑靡定，愁痛可知。伯氏入正堂东偏室，室有南北二炕，伯氏处南炕，余处北炕。窗无片纸，外面遮以纸袋及黍干后，用纸涂之，糊冻不粘，风辄振之，旋付旋坠，艰难弥缝，仅仅经夜。副使入中，有一老僧迎坐炕上，点茶以待，问其年，七十二云。⑧

与明朝不同的是，清朝前期的玉河馆，专供朝鲜使团使用，因而又被称“朝鲜馆”或“高丽馆”。由此，“玉河馆”也就成为朝鲜使馆的代称。

清康熙末年，由于“大鼻鞑子”（指俄罗斯）强占历来朝鲜使者居住的玉河馆，朝鲜使臣只好改住他处。康熙五十九年（1720）访华的李宜显在《庚子燕行录》中写道：

> 申时入北极寺宿，以大鼻鞑子先已来接玉河馆，故自礼部移送我国使臣于此寺，使之留接。⑨

洪大容《燕记》中记《藩夷殊俗》云：

> 大鼻鞑子者，即鄂罗斯，蒙古之别种。以其人皆鼻大凶悍，我国号之以此。国在沙漠外绝域，地出鼠皮及石镜，我国所贸于燕市者是也。馆于玉河馆。⑩

1765 年（乾隆三十年，英祖四十一年），洪大容随其叔父洪　访清，住的不是玉河馆，而是“南馆”。他在《燕记》中写道：

> 至崇文门内，西渡玉河桥，至朝鲜馆，前对南城，号曰南馆。屋凡四重，正堂安咨文及文物，上房在其后，副房次之，三房在副房之后。余居三房之西，间壁一炕。自入关，一行各令书者先入城修改炕舍。余居亦以棕榈构重屋于炕上，并涂以纸。北为夹室，为藏行橐。东为户，垂门帘，帘外架橙子，为短厅。厅下为篳屋，半间为马头寝处。南有分圃，甚温且明，壁数幅彩画翎毛也。一行裨、译皆居炕屋。诸下卒皆于馆东空厅各构篳屋，有财者或并为温突。自裨、译以下皆有同接，以共宿食。一行刷、驿诸马并露立于下卒篳屋之外。其大门常闭，非使行不开也。东有夹门以通衙门，一行出入皆由是门过衙门，盖以稽察出入也。⑪

“南馆”规模比玉河馆小，因而又称“南小馆”。乾隆四十二年（1777）访华的李岬（1737- 1795）在《燕行纪事》中记南小馆：

> 都城东南门即崇文门，而未至门百余步，折而西行一里，有石桥即玉河桥也。桥之南有玉河馆。顺治初设于玉河桥西岸上，以接我使。近来大鼻鞑子连为来留于此，不肯往他所，清人亦不敢拂其意，遂移我使馆所于桥南。行一里许，遵城底而西行少许，曰南小馆。第一门内有甓厅，岁币方物留置其中。正使处第二门内第一炕，副使处第二炕，而书状处第三炕。各房书者自山海关先到，以壮纸作内壁及户，修理炕突而户设门帘子。炕外铺以平床，涂褙攀子等节则已自该衙门为之。上三房所寓处甚狭窄，而副房所寓则炕室方

而大，可为三四间。闻昨年谢恩使李判府以此炕最胜，故入处而增设云。三房炕室最在后边，与副房檐角相连，庭除甚隘，仅可容膝矣。馆内炕室，总为十馀，一行分处。而驱人辈以簟为假家而入接，马则虽在雨雪之中，昼夜皆露立庭中矣。[12]

南馆（南小馆）在玉河馆之南不远，后来仍沿用“玉河馆”之名。道光八年（朝鲜纯祖二十八年，1828）访华者（佚名）撰《赴燕日记》写道：

自东岳庙行十五里到南馆。南馆在内城南城下，即所谓玉河馆。而朝鲜馆前在玉河桥边，今移入为南馆，而玉河之名今蒙冒于旧门上。扁以合同四译馆，未详四译之义。馆东别有厅室，所谓大师胥班在焉，是馆中官员也。[13]

据此可知，南馆是会同四译馆的别馆，其故址当在今前门东大街北京市公安局大楼一带。

乾隆以后朝鲜赴北京使团，大多数使用南馆。因而南馆也就成为朝鲜使的专门使馆，有时也被称为“玉河馆”。

二、朝鲜使团的“别馆”

清代朝鲜使团的正规使馆先是玉河馆，后是“南馆”。除此之外，遇有特殊情况，也有的使团另住别处。

麟坪大君（1622–1658）是一位特殊的人物，为仁宗之子，孝宗之弟。清朝势力刚刚迫使朝鲜臣服不久，他曾于1640年做为人质被扣留在沈阳。自1650年起，他三次做为谢恩使来到清国首都北京，这时朝鲜和清的关系并不融洽。1656年抵达北京时，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受到清朝廷的特别监视和管制。他不能和副使及下属一块住进玉河馆，而是受“特殊待遇”，单独住进另一处“上馆”。此次麟坪大君一行到达北京东郊通州后，得到指令，不能像以往使团那样通过朝阳门进城，而是绕道进广渠门，再经过海岱门（即崇文门）进城。他在《燕途纪行》中写道：

由海岱门入，是皇城小南门，丽谯雄壮。从大街中行向北折西，又直向北，抵别馆……别馆是籍没三公家舍，为余行空之以待云。馆宇正堂宏敞，余则寝处有裕。但左右夹室温炕甚鲜，中堂无炕，从行颇悯。[14]

麟坪大君所住的“别馆”在哪里呢？自海岱门（崇文门）直行，是今东单北大街，根据麟坪大君记述，可以判断“别馆”位置应在紫禁城以东。具体在何处无考。雍正年间，在今王府井大街甘雨胡同有朝鲜使团住的别馆。朴趾源在《热河日记》中写道：

顺治初，设朝鲜使邸于玉河西畔，称玉河馆，后为鄂罗斯所占。鄂罗斯，所谓大鼻撻子，最凶悍，清人不能制，遂设会同馆于乾鱼胡同，都统满丕之宅也。丕之被戮也，家人多自裁，故馆多鬼魅。或我国别使与冬行相值，则分寓西馆。年前别使先寓乾鱼胡同，锦城尉以冬至使寓于西馆。去岁乾鱼胡同会同馆失火，未及改建，故今行又为移寓于西馆。[15]

1777年访清的李岬在《燕行纪事》中也说：

如都统满丕之类，亦于即位二年以诸王之党律以孥籍，今乾鱼胡同馆即其家也。中门之前有一小井，当时阖家皆自裁，而妇女多投死于此井，故馆中常有鬼哭声，而此井尤甚云。[16]

由此可知，乾鱼胡同的“别馆”是籍没王公家舍，原为都统满丕（官至议政大臣、正蓝旗蒙古都统）之宅。那么，这个“别馆”的位置在今王府井大街甘雨胡同。

雍正四年（英祖二年，1726），清朝廷拨出乾鱼胡同及玉河桥边的官房各一座做为会同馆接待外国使者的馆舍。英祖九年（雍正十年，1732），李宜显作为谢恩正使访华时，住处离王府井的天主堂东堂几十步远，应该就是乾鱼胡同的别馆。据《大清会典事例》记载：乾隆二年（英祖十三年，1737），“将乾鱼胡同官房缴还工部，另拨安定门大街官房一所，以待朝鲜贡使。”这个礼部所属的会同馆别馆，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改为步军统领署，位置在今东城区地安门外大街帽儿胡同。[17]

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以李宜显为正使的冬至兼正朝圣节进贺使团访清，由于“大

鼻鞑子”（俄罗斯）强占了玉河馆，因而只好把使团临时安排在南城偏僻的“北极寺”。李宜显在《庚子燕行杂识》中记述北极寺：

> 此寺即万历甲申年间所创也。殿宇五梁三间，佛像皆黟昧。外廊三间，安关帝像。后廊五间，有三炕，余处于东，副使处于中，书状处于西，皆一间也。前有槐树三株。其西有长廊，安土地神、司命神像。左边长廊安十王塑像。大门内有关帝庙，旁有一株柳。其后左右有二间炕，炕旁有一间屋，屋上有三间楼，楼中左右置三佛像，而尘埃埋没。登兹可以眺望远近。余初欲览，闻登楼则邻家内堂入于俯见中，嫌而不果。东阶下立一碑，前面蔡君谟书，后面欧阳率更书。西阶下立二碑，一则前面李北海书，后面王右军书。一则前面苏东坡书，后面米元章书，皆集字入刻者。[18]

根据李宜显的记载，“北极寺”应即“北极庵”，其地点在今宣武区琉璃厂西前青厂胡同一带。

清乾隆时，专为朝鲜使团开设的还有个“西馆”。当同时有二个朝鲜使团在北京时，一个使馆住不下，因而另外再开设一个别馆，就是西馆。1776年，锦城尉朴明源率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与李溆带领的进贺兼谢恩使团同时在北京，李溆使团住进乾鱼胡同使馆，朴明源一行住进“西馆”。1779年乾鱼胡同使馆失火未及改建，1780年朴明源率进贺兼谢恩使团再次住进西馆。随行的朴趾源在《热河日记》记述《西馆》：

> 西馆在瞻云牌楼内，大街之西，白庙之左。在正阳门之右者称南馆，皆我国使馆也。年至使先在南馆，而别使踵至，则分处此馆。或云被籍之家也。前墙十馀间，砖刻牡丹而筑之，嵌空玲珑。正使处正堂。中庭有东西堂，副使、书状分处。余处前堂。[19]

这里“别使”所住之馆，就是“西馆”。瞻云牌楼即西单牌楼，上面题“瞻云”二字，因而又叫“瞻云坊”。1911年辛亥革命后翻修马路时，此牌楼被拆除。但西单的地名仍沿用至今。今西单路口之西北，有白庙胡同，白庙胡同之西京畿道胡同，清时有礼部所属会同馆，就是“西馆”，位置在今民族文化宫北面的中京畿道胡同。

清代，在北京不仅有朝鲜专门使馆玉河馆和小南馆还有多处“别馆”，表明朝鲜在清代外交关系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三、朝鲜馆是对中国商业贸易的中心

通过官方派遣的使团是朝鲜与清朝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最主要的渠道，在北京的朝鲜使馆，必然成为对华交流的中枢据点。每一个使团，都担负着处理双边外交事务的政治任务，而使馆不仅是使臣们的生活馆所，也是履行使命的基地。朝鲜馆是朝鲜与中国维护正常的双边关系的重要保障。

朝鲜时期，派往中国的使团规模庞大，其使行人员，除担负政治外交任务外，还具有开展对华贸易的重要职能。每个朝鲜使团，都要携带大量贡品、礼品，而清政府也要对朝鲜国王及使团进行赏赐和回赠，这种以“朝贡”方式进行的物质交换，实质上是一种双边贸易。

除了正规的“朝贡”交易，在使馆进行的非官方性质的商业活动也形成了一套惯例制度。清时，当使臣进入使馆后，清政府在使馆前张贴告示榜，规定“开市”日期，允许商人进入使馆内进行买卖。1712年（肃宗三十八年，康熙五十一年）随冬至兼谢恩使来北京的金昌业记述：

> 夕时，告示榜出来，示使臣后贴之。告示榜者，许买卖榜也。自是日，行中人盖有忙色。南货贵，故一行尽买杂物。杂物异于白丝缎疋，无定价。遇一物，辄群争之，一两价增至十两。以此所买之物，互相欺匿。译军亦言其可羞，盖在前不至如此云。译军自家卖买外，最以士夫家别付为闷其价，多是纸扇笔墨之类，以此失利甚多云。
>
> 胡人持各色物货日来馆中，纷沓如市。该告示榜揭后，门无禁，人皆任意入来故也。[20]

李岬在他的《燕行纪事》中记录了清政府

方面发布的告示榜内容:

> 礼部为晓喻事：照得朝鲜馆进贡员役到京，例于公事毕后，所有携带布匹纸张等项，许令行家铺户人等入馆交易。兹当开馆伊始，各行户等情愿交易者，务须遵照法例，现银售买，不得赊欠拖延，以慢该国员役得以及时起程回国。至史书、兵器、焰硝、牛角等项一应违禁之物，不得入馆售买。例禁甚严，合行出示晓喻，尔等行户各宜凛遵法纪，不得违犯。倘经本部查出，或别经发觉，定行从重究治，绝不姑宽。毋违特示，右仰知悉，告示会同四译云云。此乃礼部知委公事也。[21]

每当朝鲜馆住进使团后，北京的商贩便闻风而动，“至夜咻咻，异声喧闹一馆”[22]。特别是“开市”、“终市”之日，朝鲜馆就像是一个贸易市场。

对于朝鲜方面，通过贸易购回国家急需的物资，是使团担负的一项重大任务。麟坪大君出访时，购买了一批来自长城以北的马匹。除了官方购物外，朝鲜使团中跟随的商人是当时北京商业的一大主顾。使团人员个人购物也是一笔可观的消费。因而对于北京的铺商以及小贩，向朝鲜人兜售货物是赚钱的大好时机，自然不会放过，无孔不入。洪大容记述中国商人推销商品的情景:

> 此外诸商，不可尽记。岁杪入京，诸商遍馆。每至余炕，掀帘熟视，忙忙还出。请坐而不应者，知余无买卖也。不知者或以为大人公子岂无买卖，强聒不已。正月初，衙门禁诸商不得入馆。十六日，提督挂榜告示，始拦入，诸译亦不胜其苦。至十数岁儿持小小器物，遍行馆中，呼卖甚苦。可想其尚利成习也。有王姓年老者，闻是徐宗孟之妾之叔，每持各种杂物，藏于怀，引人到隐处，夸示其妙，人皆笑而不恤也。每日如是，可想其略有见售也。[23]

1855年(咸丰五年)随其从兄徐熹淳以个人身份访华的徐庆淳在《梦经堂日史》中记载商人向他推销商品的情景:

> 留馆，参局人次第来见，必问姓名官爵年纪，因何干入燕。初使马头替对，终难随问随对，乃特书：“别行，上使之从弟，进士、郎中徐海观庆淳，年五十三。”付诸座右之壁，来者见此不复问焉。余谓参局人曰：“吾非商贾行也，不过是欲观大国山川人物，不远三千里而来，身边还乏了七青八黄之银子，不妨嗅做我空空的(彼人谓贫者曰空空的)。无有好的真的东西说长论短，掂斤播两。”皆曰：“否！否！吾未见夫空空者自道空空者”。乃以文房诸宝、香案、书画摆列左右，要余鉴赏。俱是奇形异体，不可名状。周秦款识，唐宗制铸，莫辨真假。[24]

清代，由于朝鲜与中国的商业贸易是通过朝鲜使团进行，而且交易额巨大，因而在朝鲜馆周围，形成专门以朝鲜人为贸易对象的名商。他们一方面购买朝鲜物品，另一方面出售中国商品。康熙年间，有一位名叫郑世泰的商人，以从事对朝鲜贸易发家，成为北京屈指可数的富商。金昌业在《老稼斋燕行日记》中记述:

> 郑世泰，即北京买头。我国所买锦缎皆出于郑，其价银多出十万两外。自其父时以此起家，至世泰益富。而婚娶多仕宦家，以此颇有权势。锦缎外，凡干难得之货，言于郑，则无不得者。其家在玉河桥大路南边，而为朝鲜买卖，作庙堂于玉河馆门旁，昼夜焚香。[25]

李宜显也在他的《庚子燕行杂识》中记述:

> 郑世泰即北京大贾也，其富罕俪。我国所买锦缎，皆出其家。至于世所称难得之货，求之此家，无不得者。下至花果竹石，名香宝器，亦皆种种具备。家在玉河桥大路之南，制作甚宏杰，拟于官阙。为我国买卖之主，故译辈凡有大小买卖，奔走其家，昼夜如市。此人通南货，而今番货到稍迟，译辈以故延行期。使行淹速，此人实执其权矣。其容貌瘦黑，甚没风采，不似万金财主云矣。[26]

到了乾隆三十年(1765)，郑世泰的后人仍是对朝贸易中的一家重要铺商，但已出现败落迹象。在朝鲜馆周围，又出现对朝贸易的黄姓铺商，其女婿是博明，满族人，进士，官至

兵部郎中。[27]此外，还有五十余家铺商，主要从事对朝鲜贸易，被称为“东商”。

咸丰年间，朝鲜人参成为对中国贸易中的一种最有影响的商品，因而北京的“东商”多以“参局”为店铺名。1855（咸丰五年）徐庆淳住在朝鲜馆南馆，他写道：“馆门外左右几百家门楣板揭天泰人参局、广盛人参局等号，皆是交易我国物货之所。而物货中人参最为彼人所贵重，故举重以包轻云。”[28]这种对朝贸易的繁荣景象表明，在北京的朝鲜馆长期以来是朝鲜与中国的商业贸易中心。

四、两国信息文化交流的前哨阵地

朝鲜时期以儒学立国。虽然被迫成为满族统治的大清国的朝贡国，心怀不满，但是对于学习中原大国的文物制度，仍是朝鲜有识之士的坚定主张。获取各种信息，进行文化交流，朝鲜使馆是最便利的前哨阵地。

利用朝鲜馆了解清朝发生的各种信息情报，对于每年朝鲜使团都是十分重大的任务。麟坪大君访问北京时，被“软禁”在与使团隔离的“别馆”。他利用各种合法关系，在使馆中多次接见清廷的一位下级官员金汝辉。金汝辉本来是朝鲜龙湾一个有名望的家族的一员，丁卯（1627）之乱时，全家被满清军队抓到中国，后来担任清皇帝亲兵哨官。他对故国怀有很深的情感，因而经常来拜见麟坪大君，传递清政府对于朝鲜使团态度方面的消息。此外，麟坪大君还向他打听有关皇宫发生的各种事情，包括册封贵妃、皇帝率新皇后出游狩猎、孔子后裔孔有德之女、翰林石绅之女选入后宫、清太后与皇帝关系等等。打探这些宫禁秘闻，并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借以观察清朝廷的政治动向。

乾隆时期，和　（1750–1799）是一位最有实权的重臣，朝鲜使臣特别关注他的情况．和　身居军机大臣、宰辅高位，被尊称为“中堂”、“阁老”。乾隆五十五年（正祖十四年），1790），进贺兼谢恩使团在热河、圆明园和京城多次见到和　。副使徐浩修在《燕行纪》中写道：

> 和　，势倾朝者。自大臣以下，莫不趣附。而余屡见阿阁老之与和　相对，少无媚屈之态。和亦敬待，不敢侮，绝非浮沉持位者流也。大抵自今天下事，皆出于出和　、福康安。福康安而一旬联班，默察其动静。则和以迎合得志，福以进献固宠。而和则极躁妄，福则极贪鄙，一无可意底举措。皇帝已耄期，而当局之大臣如此。吁！亦危哉！人心之赖以维持，独因阿阁老之不替眷遇，是所谓以一身而系国家休戚者欤！[29]

乾隆五十九年（正宗十八年，1794），前一年做为三节年贡兼谢恩使团的书状官郑东观向国王汇报他在北京的见闻时说：

> 阁老和　，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已，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至公卿，下至舆抬，莫不侧目唾骂。[30]

朝鲜使臣能够敏锐地看清清朝当权大臣的真面目，无疑是他们在朝鲜馆时悉心观察、搜集情报的结果。1799年（嘉庆四年）正月，正在北京的三节年贡兼谢恩使一行正好赶上和　被赐死事件发生，书状官徐有闻（1762–？）在《戊午燕行录》中详细记录了这一重大事件，并抄录了和　临死前写的“绝笔诗”。[31]

朝鲜馆是外国人居住之所，按照禁例，中国官员不能自己进入，不过也有特例。乾隆五十五年（1790）二度出任礼部尚书的纪昀曾经亲自到朝鲜馆访问使团中的学者。柳得恭在《滦阳录》中记载纪昀接见柳得恭、朴齐家时说“连日官政冗忙，稍迟当赴馆畅谈。”数日后他果然亲临使馆：

> 后数日，晓岚命驾到馆，问柳、朴两检书在否。余与次修适出游来归，提督、通官惶忙酬接。晓岚留红纸小刺而去。提督者，提督会同四译馆礼部仪制司郎中兼鸿胪寺少卿，来往馆中，通官辈附丽称“衙门”，妄自尊大。及逢尚书，惶忙膝跪之状，人皆见之，以此为耻，半日虚喝未已。后余与次修归馆，首译来见，颇以为忧。余笑之曰：“吾不请，礼部尚书来，彼自来，亦且奈何！”其后晓岚书五律一

首于扇以寄之。[32]

纪晓岚所以能亲临使馆，和他本人是礼部尚书有关，因为会同馆属于礼部管辖。另一方面，也表明柳得恭、朴齐家的学问令纪昀赞赏，因而做出这种打破常规的举动。

朝鲜馆与翰林院所设庶常馆相邻。清时，进士殿试后期考试名列前茅者，得选用为“庶吉士”，进入庶常馆读书，肄业三年期满再经考试，按等第而分别授职。庶常馆是年轻文人精英汇聚之地。由于庶吉士还不是正式官职，活动比较自由，因而有许多庶吉士进入朝鲜馆访问朝鲜使团中的学者。清代著名学者阮元(1764－1849)，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进士，授翰林编修。他和另一位翰林检讨刘钚之一道来朝鲜使馆访问，受到柳得恭的接待。柳得恭写道：

> 阮元，字伯元，江南仪征人，翰林编修。刘钚之，字佩循，号信芳，山东诸城人，翰林检讨。余在馆中，二人同车而来，徘徊庭际，无人酬接，怊帐欲返。余请炕上与语，皆名士也。云“去岁供以庶吉士在间壁，与使臣相识。去岁人胡无一人来者乎?”[33]

纪昀和阮元是两位直接进入朝鲜馆的中国名气最大的学者。从众多的燕行录中可以知道，访问朝鲜馆的中国文人中，庶吉士及赶考的举人最多。1801年（嘉庆六年）冬至兼陈奏使团书状官李基宪在《燕行录》中写道：

> 陈翰林希曾与其叔庶吉士用光、举人郑丕钦来访徐稚范，携扇子柱联诗笺而赠之。副使邀见，上使亦来坐，馈以小馔，略有问答云……方其到馆也，通官辈颇阻挡，久乃许入云，盖以朝士之不宜入朝鲜馆也。[34]

陈希曾（1766－1817）字集正，号锺溪。乾隆五十八年进士，主持过贵州、江南乡试，官至工部右侍郎。除庶吉士外，到朝鲜馆访问过的进京赶考举人也很多。洪大容在北京时，他结交的浙江举人严诚、潘庭筠特别应使团“三使”（正使、副使、书状官）之邀，进入使馆互相笔谈。严诚记录会见情景：

> 顺义君李　，国君之弟。号为君者，犹中国之亲王也。诗极高妙，草书入晋人之室。顺义君以亲王兼宰相，盖正使也。金、洪二秀才引余及兰公入见之，则副使金、洪二公皆在焉，所谓“三大人”也。顺义君本别居一院，以见君二人，故来就副使之室，意极谦和可亲。三公者坐榻上，余二人亦坐榻上，中陈一几，以便作书。而二秀才者虽弟、侄之亲，竟侍立终日焉。即令公等入语，亦无有敢坐者，彼国之礼如是也。兰公方与金宰相问难不休，而顺义君则题二诗邀余和。余走笔应之，俄顷间而顺义君已再叠韵。余宜再叠韵。往反数四，每人得十四首焉。连书一纸之上，余欲携之归，而顺义君已令人匿去矣。亦一奇人也。[35]

中国文人进入玉河馆与朝鲜使臣笔谈的事例不胜枚举，这里是清代中朝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场所。

朝鲜馆的大门由中国政府派出的人员看守，中国人进入使馆经常被禁止。因而，使馆附近的店铺便成为朝鲜人和中国人进行会面笔谈的场所。徐庆淳在他的《梦经堂日史》中写道：

> 十年前，我使之入都，都中人士多有逢迎会集。自南匪以后，外藩人交通，邦禁至严，非但到处阻阁，并与赫蹄，而不相来往。曾有雅契者，约会于参局，暂时立谈。[36]

清代，负责管理朝鲜馆的中方官吏被称为“衙门”，有提督一人，大使一人，序班若干人，通官（翻译）若干人，还有守卫军事若干人。不但中国人进入使馆受衙门的禁止，使馆人员的行动也在衙门的控制之下，“门禁”制度严重地限制了使馆人员的行动身由。特别是那些以“子弟军官”名义的非正式使行人员，他们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参观游览，结交中国朋友，进行文化交流。与衙门周旋，冲破“门禁”争取外出的机会，是所有住在使馆的旅游者都大伤脑筋的事情。老稼斋金昌业住在玉河馆时，通过随行人员打通守门人，借“汲水”之名出馆游览。因为玉河馆的井水苦涩，不适宜饮用，因而要到朝阳门外的八里铺去汲水。金昌业扮做去汲水的人，得以走出使馆，游览了北京许多名胜古迹。[37]衙门的“门禁”时紧

时松，到了乾隆年间，管制逐渐放宽，但是没有衙门的准许，还是不能自由地出入使馆。洪大容住在南馆时，为了获得外出的机会，亲自求见衙门的大使和通官，送了厚重的礼物，与衙门官员建立起融洽关系，因而外出不再受阻拦。像金昌业、洪大容这样的许多的朝鲜学者文人，克服重重困难，冲破使馆森严的“门禁”，得以迈出馆门，才饱览了北京的各种人文景观，留下真实而宝贵的纪行实录，为中韩文化交流留下了永远的珍贵文化遗产。

清代北京朝鲜使馆，接待了一批又批朝鲜客人，他们中间，有德高望重的政治人物，也有学识渊博的文人学者。朝鲜馆是历史上中韩双边外交关系的里程碑，也是中韩经济贸易的集散地，还是开展中韩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玉河馆是中朝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之地，令出使者终生不能忘怀。朝鲜时期著名诗人申纬(1769—1847)于1812年作为书状官访华，12年后，他在《明雪楼书示价川金尚德》诗中写道：

苍苔落叶皇华馆，踏遍空阶倚遍栏。
茶话依然拈汉话，暂时如在玉河湾。㊳

今日，朝鲜馆的建筑物已不可找寻，然而，朝鲜馆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却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

①② (韩) 全海宗著，全善姬译：《中韩关系史论集•清代韩中朝贡关系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183–186页，第196页。

③⑰陈宗蕃编著：《燕都丛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87–188页，第386页。

④张廷玉等撰：《明史》卷七十二职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751页。

⑤(韩) 崔溥：《锦南先生漂海录》，民族文化促进会编：《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一册)，汉城：民族文化促进会，1976年，第58页。

⑥(韩) 许 ：《荷谷先生朝天集》，《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一册)。第138页。

⑦于敏中等编纂：《钦定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034页。

⑧⑳㉕㊲(韩) 金昌业：《老稼斋燕行日记》，《国译燕行录选集》(第四册)，第70页，第127页，第88页，第68页。

⑨⑱㉖(韩) 李宜显：《庚子燕行录》，《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五册)，第10页，第10页，第34页。

⑩⑪㉓㉗(韩) 洪大容：《湛轩书•燕记》，平壤：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65年，第327页，第385–386页，第321页，第320页。

⑫⑯㉑(韩) 李岬：《燕行纪事》，《国译燕行录选集》(第六册)，第36页，第132页，第51页，第51页。

⑬(韩) 佚名：《赴燕日记》，《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九册)，第102页。

⑭㉒(韩) 麟坪大君：《燕途纪行》，《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三册)，第40页，第45页。

⑮⑲(韩) 朴趾源：《热河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06页，第317页。

㉔㉘㊱(韩) 徐熹淳：《梦经堂日史》，《国译燕行录选集》(第十一册)。第142页，第141页，第147页。

㉙(韩) 徐浩修：《燕行纪》，《国译燕行录选集》(第五册)，第103页。

㉚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十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4881页。

㉛(韩) 徐有闻：《戊午燕行录》，《国译燕行录选集》(第八册)，第217–219页。

㉜㉝(韩) 柳得恭：《滦阳录》，《辽海丛书》(第二册)，沈阳：辽沈书社影印本，1985年。第326页，第329页。

㉞(韩) 李基宪：《燕行录》，《燕行录选集》(下)，汉城：成均馆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60年。第776页。

㉟朱文藻编：《日下题襟合集》，清抄本，北京大学藏。

㊳(韩) 孙八洲编：《申纬全集》，第二集，汉城：太学社，1983年。第778页。